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1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 1 2009
(第8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8)

清代前期粤海关的商品流通及税收

廖声丰

(南昌航空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南昌 330063)

摘 要:清代前期,长距离贸易的兴盛,推动了不同经济区域之间的商品交流,粤海关也由此成为全国最主要的商品流通枢纽之一。清代前期粤海关对全国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既为全国各大区域之间的经济往来提供了平台,促进了全国各区域之间的商品流通,满足了市场需求,又推动了广东自身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乾隆朝以后,粤海关税收增长主要依赖其良好的区位条件、发达的交通、优惠的外贸政策以及繁华的商品流通所致。

关键词:清代前期;粤海关;商品流通;税收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09)01-0111-08

清代前期的粤海关是清代著名的四海关之一,至鸦片战争前夕,其关税收入不仅超过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三关的总和,不仅是清代前期最重要的海关,而且位居清代户部24关中的首位,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不言而喻。但由于资料缺乏,长期以来,清代前期粤海关的研究一直是相对沉寂的领域①,这与粤海关在全国的重要地位是不相称的。基于此,本文试图从商品流通的角度,利用档案资料和其他资料对该关进行实证研究,由此认识清代前期广东地区社会的经济实况。

一、清代前期粤海关概况

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继平息三藩之乱后又统一了台湾,次年废除了针对台湾问题而设立的海禁政策。康熙二十三至二十四年,清政府首先在厦门,继之在广州、宁波、松江,分别设立了闽、粤、浙、江四海关,管理四个港口的海洋贸易和征收关税的事务[1]。其中粤海关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设置于广州,关署设置在广州城外五仙门内。此外,粤海关监督另有一所行署设在澳门,"监督时出稽查,则居之"[2]。

粤海关所属口岸众多,遍布于广东沿海各处,粤海关监督下设七个总口,即广州省城大关、澳门总口、潮州庵埠总口、惠州乌坎总口、高州梅菉总口、雷州海安总口和琼州海口总口,各总口又辖有数量不等的小口。粤海关各口岸按其功能又可分为正税口、挂号口和稽查口三类。正税口和挂号口负责报关登记填写税单和收纳关税,稽查口只负责对进出口船只及货物的稽查,不征课税[3]。乾隆末年,粤海关的征税口岸计有大关口、琼

收稿日期:2008-09-29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07JA770022);南昌航空大学航空高校基金项目(NanHang080508)

作者简介:廖声丰(1965—),男,江西赣州人,南昌航空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清代关税史.

① 戴和的《清代粤海关税收述论》(《海交史研究》1988年第1期)。李金明的《清代粤海关的设置与关税征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4期)、黄国盛的专著《鸦片战争前的东南四省海关》(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分别对清代前期粤海关的税收制度、粤海关的设置及其征税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为清代前期粤海关的深入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但这些学者对粤海关商品流通的情况探讨不多。而其他学者的研究对清代前期粤海关很少涉及,也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一个重要原因是粤海关资料主要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许多资料仍有待挖掘和利用。

州海口、潮州海口、甲子总口、梅菉总口、海安总口、澳门总口,乐会、清澜、铺前、陵水、崖州、沙荖、儋州、万州、北黎、北炮台、庵埠、澄海、潮阳、黄冈、东陇、靖海、神泉、乌墩、平海、汕尾、阳江、两家滩、雷州、廉州、钦州、江门等共33处,挂号口有溪东、双溪、汕头、南洋、卡路、达濠、后溪、海门、乌塘、漳林、揭石湖、敦头、芷了、暗铺、总巡西炮台、佛山东炮台、黄埔、虎门、紫泥、市桥、镇口等共21处,稽查口岸有埝山、鲊门、白沙、舶赊、南樵、对流、田头、锦裹山口、大码头、娘马阁、南湾、关闸等共12处[4]。从地理位置和税收量看,省城大关和澳门总口最为重要。

清代粤海关的税收组成主要是船钞、货物税和附加税等三项,其中前两项是正税,后一项为杂税。清代各榷关征税科目并不完全相同,即"则例不一,有征商税者,有征船料者,有商税、船料并征者",粤海关是商税、船料并征[2]151。粤海关的杂税项,主要是由原为管关人员私索的各种陋规,后报出归公而来的。雍正以前,关税的奏销中只有正税而没有杂税。雍正元年,财政改革,推行养廉银,并将原来各级官吏在征税时的各种勒索报出归公,由政府管理。

粤海关的货税,分为出口税和进口税两种,基本上是按货物量计征的从量关税,是一种低税率制度。康熙末年至雍正年间,进出口货物平均关税率为4%。最高的是生锌,为7.7%;最低的是茶叶,只有0.4%。而当时英国进口中国茶叶,在伦敦征收的进口税率高达128%,最低的也在80%以上[5]。清政府还多次减免进出口关税。准许货物只征单税,不征复税[6]。清朝的低税率政策,一定程度上繁荣了广东的对外贸易。

粤海关的船料又称为梁头税,通常叫作船钞税,即丈量船只梁头的宽度,按尺征税。"船钞"的征收,是沿袭明朝隆庆年间(1567—1572年)对来自南洋的洋船的丈抽之例,按船只的大小分等征税[2]181。粤海关虽然对本国出洋及沿海贸易的船只也征收船钞,但比外国船只要低的多,仅占同等外国船只船钞的19.3%[3]。这说明在近代以前,清政府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关税保护意识。

清代前期粤海关是重要的榷关之一。榷关是清政府对长途商业商业进行管理和征税的机构,有户关、工关之分。户关属户部管辖,征收百货税,以资国用。工关则属于工部管辖,征收木税,以资朝廷营缮。清代榷关经历顺、康、乾三朝的调整,到乾隆朝大致稳定下来。其中比较重要的户部关有24个:崇文门关、左右翼关、坐粮厅关、天津关、山海关、张家口关、杀虎口关、归化城关、临清关、东海关、江海关、浒墅关、淮安关、扬州关、西新关、凤阳关、芜湖关、龙江关、赣关、北新关、浙海关、闽海关、粤海关和太平关[7],它们是榷关税收中的最主要的部分。

二、清代前期粤海关的商品流通结构

(一)清代前期的粤海关的对外商品流通结构

为了更好了解清代前期的粤海关的对外商品流通结构,下面具体考察康雍时期,东印度公司一些来华贸易的商船,从粤海关返航时所载商品。

"肯尼特号"货船,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正月二十七日,从广州回航伦敦。所载的货物如下:丝织品,价值80000银两。茶叶470担,价值14000银两。瓷器价值3500银两。水银和银珠100担,价值17200银两。云南铜600箱,价值6180银两。青干姜500担,价值2000银两。胡椒(在巴达维亚装载)525担,价值3600银两。大黄15担,价值460银两。钱贝22担,价值60银两。以上价值一共127000银两[8]。

康熙六十一年(1722),预定开赴孟买的"艾尔斯号"商船,载有水银100担,价值4200银两。银珠50担,共2100银两。白锡1200担,共7200银两。糖2500担,价值7500银两。冰糖500担,价值3000银两。樟脑100担,价值2500银两。干姜250担,价值500银两。明矾1000担,价值1500两。以上共28500银两[8]165。

雍正元年(1723)年五月二十一日,"沃波尔号"货船到达澳门附近,准备回英国。载有生丝60担,价值8520银两。丝织品2850匹,价值17552银两。武夷茶1500担,价值34500银两。水银1522担,价值6384银两。银珠150担,价值6300银两。白铜2000担,价值12000银两。糖1500担,价值4200银两。冰糖1500担,价值8700银两。干姜500担,价值1000银两。明矾300担,价值420银两。黄金30个元宝,每个元宝重十两,价银100两银元,共3000银两。以上102576银两。这艘490吨的船,实载重舱货360吨及另有毛重100吨的茶叶,约750箱[8]171。

雍正二年(1724),东印度公司因为害怕“由于康熙皇帝去世,会引起中国混乱”,只派一艘船开往广州——450 吨的“麦士里菲尔德号”。该船货物准备一部分运往伦敦,一部分运往马德拉斯。计有,生丝 150 担,价值 22500 银两。丝织品 10000 匹,价值 55840 银两。茶叶 1000 担,价值 25000 银两。瓷器约 150 箱或“多到足以从船头铺到船尾”,价值 4600 银两。水银 1000 担,价值 8400 银两。白铜 340 担,价值 2040 银两。以上重量 235 吨,价值 118380 银两[8]178。

甚至有些商船并不购买其他商品,而专门购买瓷器和丝织品,且数量非常惊人。康熙五十六年(1717),从广州返回伦敦的“埃塞克斯号”货船,带回了价值 22000 镑的瓷器(约 305000 件),以及 20750 匹丝织品。由于此时“茶叶已开始代替丝成为贸易中的主要货品,但茶叶是由安徽、江西及湖南等省运来的”,所以船主不得不与中国客商订立长期的特别合约,以便该船到达中国后,能够及时装运回国[8]156。经折算,康熙末年英国一英镑相当于清朝 10.637 银两银元[8]170,该船瓷器价值 234014 银两。该船丝织品的价值,依康熙六十年 10500 匹丝织品,价值 53700 银两推算,20750 匹丝织品价值大约值 106121.4 银两左右。因此该船总价值大约 340135.4 银两。

有时英国商船不得不高价购买其所需的商品。康熙五十八年(1719)底,“卡纳冯号”货船和另外两艘货船前往中国。由于“卡纳冯号”货船在英吉利海峡遭遇了天气的压力,多次被阻滞,比其它两艘货船到达广州晚了一个月。在这个月里,而其他两艘货船,已经购买好他们所需的茶叶。“卡纳冯号”费了九牛之力,才签订到合约,茶叶不仅价钱高,也不是优级品。由于销路好,该船满载着茶叶 2209 箱及 200 桶,于康熙五十九年正月二十二日离开广州回国[8]161。

康熙六十年(1721)九月二十二日从粤海关返回英伦的“埃梅莉亚公主号”货船所携带货物有:生丝 200 担,价值 30000 银两。丝织品 10500 匹,价值 53700 银两。水银 200 担,价值 8400 银两。所带茶叶全部为上等茶,品种多、数量大:功夫茶,500 担,每担 27 银两;武夷茶,2000 担,每担 27 银两;白毫茶,250 担,每担 38 银两;瓜片茶 250 担,每担 35 银两;松萝茶 1500 担,每担 19 银两,这些茶叶价值共 119750 银两。以上总计 211850 银两[8]169。

上述六条东印度公司回航的商船,有五条船明确记载了各种商品的价值。如果将这些信息作一统计,可以发现,乾隆二十二年一口通商之前,英国来华贸易商船,从中国带走的商品,占据最大份额的是生丝和丝织品,共计 44.8%;茶叶位居第二,占 24.6%;瓷器为 14.4%,居第三;而矿产品居第四,为 9.2%。以上四项占了商品总值的 83.8%。尽管其他商品价值份额不大,但是这些商品多为矿产品、香料、调料、糖和中药等,价格虽不高,但数量亦十分惊人。

乾隆二十二年至道光二十年一口通商时期,与康熙时期相比,粤海关贸易商品结构的贸易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时期,西方各国的“夷商来粤交易,向系以货易货,其贩来呢羽、哔叽、棉花、皮张、钟表等物,换内地之绸缎、布匹、湖丝、茶叶、瓷器,彼此准定互易”[9]。其中茶叶商品货值上升到第一位。

此时,英国对华贸易占整个欧美各国贸易的绝大部分,其中东印度公司又是英国对华贸易的主要代表,因此该公司对华贸易量,基本上反映了当时西方对华贸易的状况。

表一显示,从乾隆二十五年(1760)至道光十四年(1834),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的贸易额迅速增长,增加了 6.83 倍。

出口商品中,最主要的商品是茶叶、生丝,分别占商品总值的 82%、13.6%,占商品总值的 95% 以上。而土布也是西方对华输入的重要商品,虽然它在整个商品总值中比值很小,但数量可观,尤其是它反映了英国工业革命前后对中国土布需求情况。在 19 世纪以前,英国土布所需有一个较大增长,从乾隆二十五年(1760)的土布货值 204 银两,到嘉庆二十四年(1819)的 121466 银两,增加了 595 倍,如果不是英国工业革命带来的毛纺业的发展,这种增长趋势仍将保持,但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进行,对华所需的土布急剧下降,至道光五年(1825)在整个对华商品输出总值中不足 0.05%[10]。

从英国对华输出的第二大商品丝织品来看,也同样存在下降的趋势。与此相反,对华的输出的主要商品逐渐以英国产的棉布为主。表中的其他商品以瓷器、药材为主,所占比重虽然不大,但是从货值看,数量也不小。

表1 英东印度公司自中国输出的主要商品表 单位:银两

年度		茶叶		生丝		土布		其他	
	出口商货总值	价值	占总值%	价值	占总值%	价值	占总值%	价值	占总值%
1760—64	876846	806242	91.9	3749	0.4	204	0.1	66651	7.6
1765—69	1601299	1179854	73.7	334542	20.9	5024	0.3	81879	5.0
1770—74	1415428	963257	68.1	358242	25.3	950	0.1	92949	6.5
1775—79	1208312	666039	55.1	455376	37.7	6618	0.5	80270	6.7
1780—84	1632720	1130059	69.2	376964	23.1	8533	0.5	11764	7.2
1785—89	4437123	3659266	82.5	519587	11.7	19533	0.4	238737	5.4
1790—94	4025092	3575409	88.8	274460	6.8	34580	0.9	140643	3.5
1795—99	4277416	3868126	90.4	162739	3.8	79979	1.9	166572	3.9
1817—19	5139575	4464500	86.9	183915	3.6	121466	2.4	369694	7.1
1820—24	6364871	5704908	89.6	194779	3.1	58181	0.9	407003	6.4
1825—29	6316339	5940541	94.1	–	–	612	*	375136	5.9
1830—34	5984727	5617127	93.9	–	–	–	–	367600	6.1

资料来源:转引自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1卷第275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表示该商品数据缺,"*"指该商品在总值中的比重不足0.05%。

乾隆四十年(1770)至道光十三年(1833),从英国及其殖民地印度输出到中国的主要产品依次是棉花、毛织品、金属品,分别占70.7%、27.4%和1.9%。金属品增长5倍,毛织品增长7倍,而棉花增长17倍。毛织品和棉花是以在对华货物贸易中占主要地位[10]175。

贸易量的大幅度增加,足以说明,清政府实行一口通商的过程中,并没有严厉地限制西方国家的对华贸易,粤海关作为当时唯一合法的中西贸易口岸,为中外商品交流提供了广阔的历史舞台。

经过粤海关汇集而成的出口货物除本省生产的以外,大多数是来自全国其他地方。生丝、丝织品主要来自江苏、浙江等省,尽管中英双方在早期都禁止生丝贸易,但到雍正年间,丝和丝织品仍成为对英出口的大宗商品之一[6]373;武夷茶、功夫茶来自福建,松罗茶和屯溪茶来自安徽,其他品种的茶则来自湖南、江西和浙江等省;瓷器来自福建、江西、浙江等省;清代广东不产铅铜,在粤海关装船的铅铜主要来自云南、汉口、广西等省[11];明矾、白锡、银珠等来自贵州和云南以及四川等省;糖、樟脑来自福建(包括台湾)省;大黄的数量虽不算多,但几乎每一条返航的外国船,都会装载大黄。"大黄出产川陕二省,商人运贩到粤,于省城、佛山两处售卖,每年约二十万余斤,其卖与各国夷人约十万余斤"[2]354;广西桂皮闻名全国,其品种有西桂和东桂之分,"西桂产于桂平、容县、藤县、平南四县,东桂产于罗定一州,而贩运之道又分为两途,东路水运西桂,由浔梧顺朔西江,东桂由罗定内河至肇庆顺嘲西江,沿流而下至广州省城出海"[12]。

这些商品,除部分在广东消费外,大量运往海外。据关税档案记载,从康熙五十四年(1715)至五十九年(1720),英国、法国、葡萄牙等国家驶入广州贸易的船只达到68艘,把西欧各国的毛布织物、自鸣钟、仪器、玻璃等工业品及东南亚国家的香料、药材、硬木、棉花、黑铅、鱼翅等商品运进广州市场出售,然后从中国购买茶叶、生丝、绸缎、磁、器等货物运回西欧各国倾销[13]。因此早在乾隆前期,粤海关就成为全国外贸的中心。

(二)清代前期粤海关的内贸商品流通结构

清代前期,粤海关不仅是当时的外贸中心,亦为国内贸易的重要集散地。在粤海关各口岸中转的国内主要商品有:

1. 粮食

清代前期,广东除通过海外市场输入粮食外,还通过西江水道,从广西进口大量粮食。乾隆二十二年,两广总督陈宏谋曾云:"广东一省,非山即海,田地本少,烟户繁庶,每年食米全仗广西运贩接济。"[14]清代广西农业产量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不少地方谷米自给有余,从而使大批余粮运销广东,西江则是广东最大的粮食运输通道。乾隆年间,戎墟系广西门户,位于西江上游,交通便捷,为广西粮食输往广东的最大集散地。广西粮食东运,以梧州、浔州两府最多,因此清政府在西江口设立了梧州关、浔州关,主要征收米税。"梧、浔(两关)所

征之税，历来系米谷麦豆为主。”[15] 雍正年间，广东每年“即（便）丰收而乞籴于西省者，犹不下一二百万石”[16]。以梧州关为例，表二显示，雍正四年至七年，该关年均征米税 47470.57 银两，而梧关税则中，米每百斤 0.014 银两[17]，按照税率，折合米 3401055 石。尽管这些粮食不可能全部运销广东，但无疑大部分是运销广东的。即以 60% 计算，梧州关运往广东的粮食达 2040633 石，数量非常大。

乾隆时期是广西粮食东运的最盛时期，梧州关乾隆三十年至三十一年关期，征收米税 63060.5 银两，折合米 4504321 石。如仍以 60% 计算，则广西米运往广东每年东运量 2702593 石。西米的源源东流，曾经长期稳定了珠江三角洲的粮食价格。据陈春声研究，乾隆六十年间，广州府的平均米价每石为 1.56 两，肇庆府为 1.53 两，而潮州府和嘉应府分别为 1.72 两和 1.81 两[18]。广、肇二府商品经济比潮、嘉二府要发达，按理其米价应该高于后者，但结果却恰好相反，主要是因为广、肇二府能够通过西江，得到源源不断的西米接济。

表 2　清代梧州关过关粮食量

关期	过关米谷税（银两）	折合米（石）
雍正 4.4.11 - 5.3.10	47508.292	3393449
雍正 5.3.11—6.3.10	47075.4	3393428
雍正 6.3.11—7.3.10	47828.02	3416287
平均	47470.57	3401055

资料来源：民国《梧州府志》卷之七。

此外，北江亦是米谷的重要通道。两湖流域是清代著名的稻米产区，大批的洞庭米谷溯湘江南下。这些粮食汇集于广州和佛山[19]。通过以上两个口岸，将粮食运销省内各府县。粤海关口岸不仅发挥了粮食中转的功能，而且还把广东市场与全国市场紧密联系起来。

2. 棉花和棉布

清初时广东的棉纺业得到较大发展，所需棉花，主要从江南采购。据褚华《木棉谱》记载：清初时在松江，“闽粤人于二三月载糖霜来卖。秋则不买布，而止买花衣以归，……皆装布囊累累，盖彼中自能纺织也”[20]。松江棉花通过北江或东南沿海航线运来，从外省贩来的棉布则以松江布和湖广布为多，两大经济区的商品交流与互补，促进了各自经济区商品经济的发展。

3. 糖、烟

明清两代，福建、广东是糖的主要产区，也是经粤海关中转到全国各地的重要商品。明代广州府和潮州府各县，就有大量白糖售于东、西二洋和国内各省。清代广东糖的产地进一步扩大，远销路线更长。除广州、澳门集中了部分黄、白糖出口外，黄、白糖均由海上北运江浙、上海、天津等地。烟叶是广东清代兴起的一项重要商品，这些烟叶经北江和沿海而远销各地。通过考察全国其他榷关如浒墅关、北新关、天津关、崇文门关、赣关、武昌关等关的商品流通，我们也能够很清楚地辨别出广东糖烟产品在各地流通的痕迹。

4. 其他手工制品

清代广东手工制品种类繁多，其运输亦呈繁盛。如佛山的铁制品海内外驰名，除在本地销售外，大多数产品运销两湖、闽、浙、赣等省乃至海外地区。石湾陶业在清代发展迅速，产品远销海内外。丝织品也是清代前期广东的一大名优产品，除部分商品沿北江经过大庾岭商道——赣江——长江——运河销往中南、中原乃至东北、西北地区，其中的大部分则远销东南亚和欧美地区。

三、清代前期粤海关税收的增长

康熙年间，粤海关与全国其他榷关一样，关税只需缴足定额，盈余部分由监督自行处理，不必向朝廷奏报。因而仅仅从定额数字，难于了解当时粤海关的实际税收。雍正元年之后，清代榷关逐渐建立了盈余银上交的税收考核制度，此时税收数据，亦能较准确地反映出各关的商品流通状况。雍正四年以来，粤海关税收虽有盈亏，但税收的增长趋势十分明显。

正如表三所示，粤海关的税收从雍正四年的 129850 银两，增加到雍正十三年的 231550 银两，雍正十年更

达到309107.9银两,年均税收为219446银两。乾隆十五年至十九年,每年税收几乎都在50万银两左右。乾隆六年至乾隆二十二年,粤海关年均税收382967.6银两,仅仅二十年税收就增加了1.75倍。

表3 雍正4年至乾隆22年粤海关收入表 **单位:银两**

关期	粤海关税收	关期	粤海关税收
雍4.1.24—5.1.23	129850	乾16.11.26—17.11.25	502769.065
雍7.4.12—8.3.11	198062	乾17.11.26—18.11.25	514810.008
雍8.3.12—9.3.11	228659.7	乾18.11.26—19.10.25	515318.039
雍9.3.12—10.3.11	309107.9	乾19.10.26—20.10.25	486267.794
雍13.4.25—乾1.3.24	231550	乾20.10.26—21.10.25	404957.048
乾6.1.25—7.1.24	296924.9	乾21.10.26—22.9.25	320530.678
乾15.12.26—16.11.25	459804.284		

资料来源:根据黄国盛的《鸦片战争前的东南四省海关》第420-424页整理。

粤海关税收的增长主要依赖于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其税收包括外贸税和国内贸易税。乾隆以前,后者在整个关税中占有很大比重。雍正年间粤海关年均税收为231550银两,最高的年份也只有309107.9银两。粤海关七总口中,广州大关口岸主要征收国际贸易税,其税收"视番船多少为盈缩",其盈缩变化对粤海关的增长与否至为关键。因为粤海关的税收以广州大关的"虎门为重,而濠境一澳,杂处诸番,百货流通,定则征税,故澳门次之"[2]59。其余六总口每年约共征银115979银两[2]60-68,这个数字,不包括外船的征银数,可视为广东沿海贸易税[6]209,属于国内贸易税,它占雍正时期税收总额的52.85%。可见,雍正时期,粤海关的外贸税在其税收中并不占绝对优势。但是进入乾隆朝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雍正元年至十三年,英国来广州的货船有34只,而从乾隆元年至十三年,英国到达广州的货船为59只[11]309-321,后者是前者的1.74倍。就关税收入而言,后者是前者的1.75倍,两组数字惊人地相似。乾隆初年以后,"粤海关每年收税五十余万两",其中省城大关以外各口岸所征的国内贸易税仅得"十二、三万","惟大关税银四十余万,……全藉洋船出入,按则征收。"[21]以至"粤(海)关每年征收税数,向视洋船多寡以定盈细"[22]。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粤海关税收有了较大的增长,这种趋势在一口通商以后更加明显。乾隆五十二年(1787)至乾隆六十年(1795)间,粤海关首次每年达到100多万两的税银,比前一个十年,增加61%以上。嘉道朝以后粤海关税收继续增长。

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将"四口通商"改为"一口通商"。正如表四所示,一口通商政策实行以后,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的税收,虽然各有增减,但总体变化不大,而粤海关增加较为迅速。有必要说明的是,早在"一

表4 乾隆22年至道光20年四海关年均税收表 **单位:银两**

关期	粤海关	闽海关	浙海关	江海关
乾隆22—31年	426345.7	342512.2	89414.39	71452.6
乾隆32—41年	558662.5	362114.8	89658.28	72055.14
乾隆42—51年	635924	385193.4	90075.88	72542.6
乾隆52—嘉庆元年	1023935.3	306912.6	90275.31	72867.95
嘉庆2—11年	1250706.3	205232	72731.48	73111.88
嘉庆12—21年	1425864.8	193360.43	79701.2	73600.31
嘉庆22—道光6年	1406489.6	195187.17	79691.94	73651.15
道光7—16年	1547295.1	180000.67	79385.98	73313.17
道光17—20年	1365685.33	176910	79178.69	70355
年均	1071212.11	260824.78	83345.91	72550

资料来源:根据黄国盛的《鸦片战争前的东南四省海关》第419—442页统计。

口通商”政策实行之前，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长期很少有外国贸易船只到关，因此外贸税很少，而主要征收国内贸易税。早在十七世纪时，清代的关税就有集中粤海关的倾向，从四海关的外国船只到关数量以及税收看，粤海关与浙海关、闽海关、江海关相差悬殊。因此，清政府停止其他三个海关“有名无实”的对外职能，只启用粤海关，作为对外通商的口岸，无论就政治成本还是经济成本而言，都是合算的，也是合乎情理的。从法理的角度看，任何主权国家都有权制定自己的对外贸易政策，有权决定开放哪些港口或关闭哪些港口。

清代前期，粤海关税收迅速增加的原因主要有四：

一是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发达的交通。广州处于中国的南大门，清代前期从广州开往世界各地的航线基本上全部开通，正如一位外国商人于道光十三年(1833)所说，“广州的地理形势和中国的政策，再加上其他各种原因，使得广州成为对内对外贸易的极盛之地”[10]307。粤海关税收之所以快速增长，与其较为发达的河运、海运条件密不可分的。珠江水系纵横整个省境，海路与水路河又相互沟通。以广州为中枢，有水运商路通向四方[23]。海运也非常发达，“粤东之海，东起潮州，西尽廉，南尽琼崖。凡分三路，在在均有出海门户。自海禁既开，帆樯鳞集，瞻星戴斗，咸望虎门而来。”[2]59广东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便捷的海运，吸引了大批的西方船只来粤贸易。粤海关从康熙三十八年至乾隆十五年就接受西方的商船 146 只，而同时期浙海关口岸仅到 16 只，闽海关 9 只，江海关则无船到达[11]309-321。清前中期，广东的国际贸易，无论是远洋帆船的只数，还是关税总额，均比浙江、福建和江南各省要多。与此同时广东也以广州为中心，通过海运、水运、陆运，把海外的各种商品转运到国内各区域市场。

从更深的层次看，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由于中国的边境危机始终在北方，而南方则相对比较稳定，即使在明末清初的几十年海禁中，广州繁华的海外贸易也从未中断过。这是福建、浙江、江南、天津、东北沿海城市从未有过的现象，因而康熙二十二年，清政府设立四海关时，粤海关所定税额最高。粤海关因其所处的地理位置特别重要，故专门设有海关监督，梁廷枏曾经非常自豪地说：“我朝厘定关榷，官制有兼管、有简充。天下海关在福建省，辖以将军；在浙江、江苏者，辖以巡抚；唯广东粤海专设监督，诚重其任也。”[2]114

二是有效的管理。尽管当时的海关，无论从组织到税制，都极不完善，清政府也没有从改变国策的角度去发展商业贸易，对外贸仍然作了不少限制，但是较前代的朝贡贸易制度，也有重大改变，不再以“宣示国威”、“厚往而薄来”，而是以从中获利、有利国计民生作为贸易交换为基本原则[24]。

三是优惠的外贸政策。清政府还实行低税制优待外商贸易，当时对进口商品所征收的货税是很轻的，大约是货物价值的 1%—2%，最多是 6%，与此同时，清政府还不断实行减税制度，优待外商，招徕贸易[25]。一位英国商人说，“绝大多数在广州住过的作证人都一致声称：广州的生意几乎比世界上一切其他地方都更为方便好做。”[9]良好的外贸环境，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国的商人汇集广州。

四是中国拥有大量物美价廉的商品。如，浙江、福建、安徽、江西等省的茶叶，江、浙生丝、纺绸以及织布，江西、广东的陶瓷等商品，为粤海关的出口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充足的货源。

正是长距离贸易的兴盛，使粤海关成为国内外著名的商品贸易中心，发达的商品流通为粤海关提供了丰富的税源。随着一口通商制度的实行，粤海关的对外贸易特色愈加明显。与此同时，清代前期粤海关对全国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为全国各大区域之间的经济往来提供了平台，促进了全国各区域之间的商品流通，满足了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又推动了广东自身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 彭泽益. 清初四榷关地点和贸易量的考察[J]. 社会科学战线，1984，(3)：36-43.
[2] 梁廷枏. 粤海关志[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115.
[3] 戴　和. 清代粤海关税收述论[J]. 海交史研究. 1988，(1)：61-68.
[4] 佚　名. 关税成案辑要第 3 册[O]. 乾隆抄本，国家图书馆藏.
[5] 徐德志，等. 广东对外经济贸易史[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98.
[6] 沈光耀. 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369.
[7] 王庆云. 石渠余记卷 6[O]. 光绪二十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8] (英)马 士. 东印度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141 - 142.
[9] 严中平. 英国棉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J]. 历史研究,1955,(1):29 - 36.
[10] 姚贤镐.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1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62:275.
[11] 叶选恩. 广东航运史(古代部分)[M]. 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180.
[12] 两广总督张之洞折[O]. 光绪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3] 吕 坚. 论康熙时期与西欧的贸易[J]. 历史档案,1981,(4):56 - 61.
[14] 罗一星. 略论清代前期的西米东流[J]. 学术论坛,1987,(3):31 - 36.
[15] 广西巡抚舒络折[O]. 乾隆十五年九月十七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6] 闽广总督鄂尔泰折[O]. 雍正八年四月二十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7] 钦定户部则例. 梧州关税则[O]. 国家图书馆藏.
[18] 陈春声. 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128.
[19] 罗一星. 清代前期岭南二元中心市场说[J]. 广东社会科学,1987,(4):58 - 64.
[20] 褚 华. 木棉谱[M]//谢国桢. 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中).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0:110.
[21] 和 坤,等折[O]. 乾隆四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折.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2] 李侍尧折[O]. 乾隆二十五年三月初九日折.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3] 叶显恩. 清代广东水运与社会经济[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3):1 - 10.
[24] 郑德华. "一口通商"与"澳门航道"[J]. 学术研究,1999,(12):35 - 42.
[25] 黄启臣. 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J]. 历史研究,1986,(4):32 - 41.

Commodity Circulation and Revenue of Qing Dynasty Prior Period Yue Customs

LIAO Sheng-feng
(*Nanchang Aerial Univeristy Marxism college*, *Nanchang* 330063, *China*)

Abstract: Qing Dynasty prior period, flourishing of long distances trade, promoted commodity circulation among different economic areas. Yue customs became one of uppermost commodity current center nationwide, and advanced commodity current. Yue customs bore important action for countrywide economy in Qing Dynasty prior period. On The one hand, it provided flat roof for districts, promoted circulation of commodities, filled marketable need, on the other hand it impeled Guangdong personal commodity economy. After chiarnlurng dynasty, nicer zone bit condition, unprimitive traffic, favourable foreign trade policy and luxuriant commodity circulation, boosted Yue customs taxation.

Key Words: Qing Dynasty prior period; Yue customs; commodity circulation; taxation